

中国古代史讲义

上册

(宋元)

兰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翻印

第七章

五代十国辽宋金元——封建經濟繼續发展·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織。 元末紅巾軍大起义

第一节 辽、五代、十国并峙时期

一、辽的建立。辽的政治經濟

〔辽的建立〕九世紀末期，契丹族的氏族社会已在迅速瓦解，氏族組織的管理机关逐渐轉化为国家机关。

世襲軍事首领“夷离勤”的耶律氏，操持着“专征伐”的大权，在对族外的掠夺战争中扩大了自己的财富。耶律阿保机从公元901年任“夷离勤”后，对四周諸部族和长城南的汉族地区更屡次发动掠夺战争，大量地俘虏人口和牲畜，加强本部的实力。到公元907年，阿保机推翻了遥辇氏，自己做了契丹族的联盟酋长。到916年，阿保机就建立了契丹国（辽国），称帝建元了。

〔辽的政治經濟〕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之后，任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等人为辽朝制定了一些封建主义的典章制度。到他晚年，灭掉了东北方面的渤海国，其子耶律德光继位后，又从后晋获得燕云十六州这一广大汉族地区，这时的辽政权已成为一个以契丹貴族为主，包括大量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内的封建政权了。

辽国境内有許多民族，按照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加以区分，可以統括为两类：一类是“耕稼以食，城郭以居”的汉族人和旧渤海国人；一类是“漁猎以食，卓马为家”的契丹族人和另外許多少数民族中人。为适应这种情况，辽朝制定了一种“胡”“汉分治”的双軌行政制度：統治契丹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一律用契丹貴族，凡属于“宮、帳、部族、

属国”和“兵机、武途、群牧”范围内的事，都由他们负责；统治汉族和旧渤海国人民的，杂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凡属于“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和“文途、丁赋之政”，都由他们负责。

从辽朝初年起，就在其统治区内建置了一些州县，地方行政官有刺史、县令，还有节度使、防御使等名号。

在辽的地方行政区划中，还有一种“头下军州”。这种州，都是契丹贵族、勋戚和部族首领立有战功者，以其所分得或俘获的人口而设置的。“头下州”大都修建城郭作聚居之地。被俘的汉人和渤海人，多被安置在适于农耕的地区，有技艺的则使其从事手工业。这些从事农耕的人，一方面要向领有此“头下州”的贵族纳实物地租，另外还须向辽政府交纳课税。“头下州”的官吏，除节度使外，都由各该州的贵族委派。州境内的租税收入，除酒税须交辽政府外，其余全归“头下州”的贵族。

辽的首都临潢府（今辽宁巴林左旗附近）的周围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阿保机就把他南攻燕蓟和求攻扶余所俘人户分散安置在这一地区。汉族地区的农耕技术和工具都从此传入，极有利于辽的农业发展。到936年燕云十六州归属辽政权之后，这一地区的具有手工艺技术的人，被迁徙到临潢府的日益加多，因而在临潢府城内，布帛綾錦等类作坊也都出现了。

灵河（今大凌河）流域的州县居民，也多以养蚕织丝为业。他们只向辽政府输纳蚕丝而不交纳谷物，叫做“丝蚕户”。第十世纪中叶，辽政府还在灵河流域设置了一个弘政县（今辽宁义县境内），把从定州俘获的一些擅长织造技巧的人安置在这里。从此，弘政县及其相邻的白川州（今辽宁朝阳县）就都以生产精细的丝织品著名了。

辽的泽州（今长城喜峰口外）有银冶，柳河（今长城外伊逊河）有

鐵冶。附近的山区林木繁茂，近山居民多以燒炭为业。

辽灭渤海国，所得辽阳府及其所属各州县，“地衍土沃”适于农耕，且有“木、鉄、魚、盐之利”。辽政府把渤海国遺民大量迁徙于该区域之内，一方面是为了分化渤海遺民，另方面也是要使这地区的农田和“木鉄魚盐之利”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开采。在第十世紀中叶，辽海地区已经是“編戶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局面了。

三 五代。中原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

〔五代〕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統治。在鎮压农民軍的过程中兴起于各地的新軍閥，为了扩大各自的統治地盘而攻战不已。农民軍的叛徒朱温，在兼并战争中发展成为中原地区最強大的軍閥。他于907年廢掉了唐的最后一个皇帝，在开封建立了后梁王朝。十六年后，割据在太原的李存勖发动了多次攻战，终于把后梁推翻，在洛阳建立了后唐王朝。十三年后，做太原节度使的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把契丹兵馬勾引了来，帮他推翻了后唐，在开封建立了后晋王朝。后晋建国仅十一年，就又被契丹所灭。太原节度使刘知远乘机入据中原，在开封建立了后汉王朝。仅仅四年，禁軍統帅郭威又推翻了后汉而建立了后周。后周建国仅九年，在960年被赵匡胤发动的軍事政变所推翻。

〔中原人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后梁的第一个皇帝朱温的統治异常殘暴。当他和李存勖爭夺河北的地盘时，他竟下令关闭深州和冀州的城门，把当地的士兵全部屠杀。这事件引起河北人民的极大憤怒，到他再領兵去与李存勖爭夺滹县（今河北景县）时，当地农民都扛起锄头和棍棒給以迎头痛击，使他不得不拋棄大量軍资器械，狼狈逃窜。

920年，陈州地区的农民，在母乙和董乙的领导下，起而反抗后

梁的統治。起义群众千余人，首先对当地的豪绅不法地主給以打击，继即攻打州县城鎮，攻占了陈、颍、蔡三州，并多次打败了后梁禁軍。后来，后梁統治者出动全部禁軍，并调集好几个州郡的地方軍隊，对起义軍“合勢追击”，起义軍終于被扑灭。

处于战乱局势中的中原地区的农民，在困难条件下依然坚持生产。洛阳及其附近諸州郡的“田夫田妇”都“相劝以耕桑为务”。邻里之间也都乐于互相帮助，使得缺少劳力或牲畜的人家也都能及时地耕种和收获。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农村当中，农业生产繼續有所发展。

〔契丹南侵和华北中原人民反契丹的斗争〕 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人民出卖給契丹，更加增长了契丹貴族对土地的貪慾。944年春，契丹貴族从幽州和云中两路南犯，在德州和貝州（今河北清河县）等地遭受到“乡社兵”的迎头痛击，不得不撤兵北归。946年九月，契丹貴族再次大举南犯。后晋派去抵御的軍隊紛紛降敌，到岁末，契丹軍隊攻陷了后晋都城开封。契丹主耶律德光于947年正月在开封重新举行即位仪式，并改国号为辽。契丹貴族对华北和中原人民肆行压榨：一，纵兵四出搶掠，称为打草谷，开封及其周圍几百里內民间財貨和牲畜，几被搶劫一空。二，派人在开封及各州县搜刮錢帛，砍伐林木。三，把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州县官吏尽量換用契丹貴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中的貴族，或投靠契丹貴族敗类，让他们到各州县去横征暴敛。

这时，后晋政权已被推翻，后晋軍隊已經瓦解，在太原的刘知远采取观望态度，不敢抗击契丹兵马，未被契丹擄获的后晋高级官僚也紛紛降契丹。但是华北和中原的广大劳动人民则群起斗争，抗击契丹入侵軍。他们随地聚合，多者几万人，少者也不下千百人。他们攻占州县城，斩杀契丹統治者派来的官吏。河南的归德，安徽的亳州，山东半島的密州

(今諸城县)，黄河以北的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和滑州(今河南省濮阳县)，都被起义民軍攻占了。另外，河北的定州有孙方簡等领导的起义軍，山西、陝西有王易、侯章等人领导的起义軍，他们也都給予契丹入侵者以沉重打击。

起义民軍的強烈打击，使得耶律德光认识到，这里的人民是不容易用武力制服的，因而在947年的三月，他就急忙从开封撤退，在撤退途中病死在河北栾县的杀胡林。

汉族人民的这次武装反抗，把契丹貴族及其南侵軍赶出了中原和华北，并使契丹貴族从此不敢再长驅直入到黄河以南，終辽之世，他们也不敢把辽的首都迁到燕京。

三 十国。南方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

〔十国〕 九世紀末，占有长江下游和淮南地区的軍閥楊行密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国号吳。937年，李昇推翻吳政权，建立南唐。在浙江流域和太湖周圍的十三州之地，則是軍閥錢鏐的割据地区，国号吳越，建都杭州。占有四川的軍閥王建，在朱温称帝之后，也在成都建立政权，是为前蜀。924年前蜀为后唐所灭。后唐派往四川的軍人孟知祥于935年又在成都独立，是为后蜀。占据了湖南的潭、漵、衡、道等二十几州之地的马殷，也于十世紀初年在潭州(今长沙)建立楚国。占据了荆、归，峡三州的高季兴，在后唐时独立为南平政权，在十国当中它是最小最弱的一个。王審知和王延钧，父子相继，割据泉、汀等五州之地，叫做閩。917年，占据广州和潮、容、邕、韶諸州的刘龔(儼)建立了南汉国，都于广州。951年郭威推翻后汉王朝之后，在太原做留守的后汉皇亲刘崇就在太原宣告独立，他占有河东地区的并、汾、忻、代等十二州之地，国号北汉，是十国当中唯一在

北方的国家。

〔南方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南唐政权建立之后，把统治地盘扩展到今江西、湖北，以至湖南的一部分地区，这里，和吴越政权所有的浙水两岸、太湖四周各地，都是河渠纵横、湖泊港汊较多的地方。这些地区的农民们，特别是江南水乡和浙东浙西的农民们，在河渠两岸或濒临湖泊的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隔水，叫做圩（围）田。沿堤坝修建许多闸门，旱则开闸引水入圩，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免泛滥成灾。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努力，到十世纪中期，吴越境内的所有河渠大都修造了堤坝和闸门，用人工控制水流，使其蓄洩有时。这样，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加强抗拒水旱灾害的能力。

十国的每一国内，阶级矛盾全都十分尖锐。规模较大的一次反抗斗争，是三十年代中期爆发于南汉国境内的张遇贤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军攻占了惠州县城，推张遇贤为王，建立了农民政权。942年，张遇贤率起义群众十多万人转师北进，越过大庾岭，攻占了虔州（今赣州）附近的一些县城，多次打败南唐政府在虔州的驻军。

起义军以白云洞（今零都县西四十里）为基地，四向出击。南唐政府增派军队进行镇压，并在起义军中收买叛变分子作内应，943年冬天，这支起义军失败了。

第二节 北宋与辽对峙时期

一 北宋政权的建立及其巩固统治的措施。 王小波李顺的起义

〔北宋政权的建立和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公元960年正月，后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

仍以开封为都城。是为北宋。

这时候，在南方的成都、常德、江陵、杭州、金陵、广州、泉州和北方的太原，各有一个割据政权，而建都在临潢府的辽国，更是在宋的北边的一个劲敌。

北宋建国三年后即开始其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其战略计划是先消灭南方的那些割据势力，然后再去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最高统治集团认为，当时自身的军事力量对辽还不能有必胜的把握，暂时只能在北边的国境线上采取守势；而南方的几个割据势力，所占据的却大都是物产丰富地区，广州、泉州更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这些政权的实力都较薄弱，先对它们用兵既易于制胜，而在得到这些地区之后，军政费用便会充裕，此后才可去收复燕云。

963年，北宋首先出兵把湖南湖北的割据政权消灭掉，其后又相继灭掉了后蜀、南汉和南唐，到978年吴越被迫纳地归附，南方的割据势力就全被消灭了。次年，北汉也为北宋所灭。

〔北宋政权巩固统治的措施〕 为了防制藩镇割据的重演，北宋政府削减州郡长官的事权，不许其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兵权也都收归中央政府。州郡长官必须文人充任，且还设副长官以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每路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官，总管所辖州郡的财政司法等事。这样，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任何行政都可以直接行使权力了。

宰相之权也被分割。不但在宰相之下设置了参知政事，而且还添设了枢密使和副使以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添设了三司使和副使，以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

禁军也不再设置最高统帅，而分设马军统帅和步军统帅。这些统帅虽统领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这就使他们

很难发动军事政变。带兵的将官时常更换，使得“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以防范士兵与将领发生深厚关系。军队的驻地地点也时常更换，名义上是借此使士兵“习勤苦、均劳佚”，实际上也是防范军队与地方发生密切关系。

北宋初年的最高统治者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①。因此，把加强对广大农民的束缚和镇压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最重要的手段。

北宋沿用唐的雇佣兵制度，把破产农民招收到军队中去，免得他们“挺而走险”，武装暴动。凡是发生灾荒的地方，就在那里大量招兵，甚至强制饥民入伍。北宋统治者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②。这样一来，主要是供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在北宋就大为扩大和加强了。

在禁军之外，每个州县还都有一定数量的厢军和弓手，分设总管、钤辖和“捉贼使臣”等职加以统领，完全是用以镇压各地农民的。凡采矿或冶铸处所，聚集群众较多的地方，北宋统治者更加意“警备”，总是选一些最“得力”的人员去担任县尉、巡檢等职。

从唐代后期以来，各地人民多因宗教信仰、或因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要，相互结合为乡社。到北宋初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各地，都出现很多这样的组织，有的且“设置教头，练习兵仗”。北宋政府对于这类组织，一律严加取缔。它对任何“星星之火”都怀有恐怖，唯恐其发展为燎原烈火。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四川地区的农民起义〕 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风

① 《楊文公談苑》（自《皇宋事实类苑》轉引）。

② 晁說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暴对四川的冲击比较轻微，四川的封建生产关系没有得到改善。那里土地集中的情况特别严重，赤贫农民的数目高达全境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豪强大地主往往拥有几十、几百乃至上千家佃户，称为旁户。旁户们除向地主交纳地租外，应由地主向政府交纳的课税，即所谓租调庸敛，也完全直接归旁户负担。地主役使旁户几同奴隶主役使奴隶。①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当地比较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是很不适应的。

北宋统治者灭掉后蜀以后，对富饶的四川地区大肆掠夺。他们为满足其对丝织品的需要，规定四川的赋税“皆以匹帛折充”。他们在成都设置了一个博买务，迫令四川人民依照定期定量为封建国家织作一些冰纨绮绣等类的精美丝织品，并严禁民间买卖。四川地区茶的产量很多，北宋政府也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由政府专营。

公元992年前后，四川又连年遭受旱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993年春，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广大旁户，就在“因叛茶失职”的贫苦商贩王小波的领导下，在眉州（今眉山县）起义，对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进行武装反抗。

起义之后，王小波向广大劳动人民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个均贫富的口号表达了农民阶级对封建所有制的痛恨，反映了农民们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的群众的响应，举行起义十来天内，参加的已达好几万人。起义军攻占彭山县后，把贪脏害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把县署所存金帛散发给群众。这些措施受到劳苦大众的热烈拥护。起义队伍更加壮大起来。

这年冬天，起义军在邛州（今邛崃县）境内打败了北宋官军，打死其指挥官，王小波也在作战中不幸负伤牺牲。起义群众拥戴李顺继续领

① 《宋会要稿·刑法二之五》。

导革命斗争。李顺仍然贯彻均贫富的主张，义军每到一地，首先招集当地的“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产，计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使起义斗争达到了高潮。李顺在那里即位称王，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大蜀。这时候，“众号百万”的起义军，纪律严明，对人民“一无所犯”，因而他们“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北起绵州（今绵阳县）、南到巫峡的广大地区，基本上都已落入起义军的掌握中。北宋在四川的统治迅速崩溃。

北宋朝廷闻知起义军攻占成都之后，极为震动，立即派遣禁军分别从长江和川北两路向四川进军。这时候，李顺一方面派出二十万义军去进攻梓州（今三台），另一方面又派一支义军去进攻川北的剑门关，希图在北宋禁军来到之前先把剑门关夺取到手，就能很容易地把宋军阻截在这一关口之外。攻夺战没有成功，宋军主力于四月从剑门关大量涌入，并开到梓州，与守城的宋军内外夹击。围攻梓州的起义军，在奋勇搏斗八十余日之后，终于被迫撤退。

宋军随即围攻成都。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十多万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成都最终又落入宋军手中。

嘉州（今乐山）的起义军统帅张余人沿江东下，连克八个州郡，人数发展到十万以上。张余出动了上千只船去猛扑夔州（今奉节），想要打出四川，向长江中下游发展。但遭到溯江入川的宋军的袭击，损失沉重，两万多名战士惨遭杀害。在连续奋战八九个月之后，张余被迫退回嘉州，996年二月，在作战失败后英勇牺牲。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经过起义军对豪强地主的打击，旁户，这一名称从此已不再出现了，这表明四川地区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多少得到了一些改善；最为人民痛恨的成都博买务，被起义军彻底砸烂，北宋

政府再也不敢重设了；四川的茶叶官买官卖制度，此后也改为由“民间贩卖，量行收税”。可见这次起义对四川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有所改造。

三 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末农民战争开创了一些新的历史条件。劳动人民在较前稍好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了北宋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创造了北宋社会经济的繁荣局面。

〔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北宋，佃农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封建国家主要采用按地亩征收两税的剥削方式，对农民的徭役征发也相对地有所减少。北宋以前，地主可随意对佃户剥夺其租佃权，到北宋，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佃户也可以主动地脱离甲地主而去租种乙地主的土地。佃客在购买三五亩农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而自立户名。近似奴婢的僮仆，到宋代也被看作是雇佣良人了。

北宋时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耨车脚的铁铧，在中原和华北地区都已普遍使用。这说明耕作程序的增多和更加精耕细作。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和引水上山的高转筒车，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

排灌工具的增多和排灌效能的提高，使得长江中下游各地圩田的数量也大有增加。北宋中叶，单是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南方的山田也得到了大量的垦辟。

从越南传入中国的占城稻，北宋以前仅为福建地区农民所栽种，北宋初年则已推广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占城稻抗旱力强，“不择地而生”，这使种稻的土地面积可以扩大；又因它成熟较快，可以在收割之后和下次插秧之前，播种一季小麦，就能够“刈麦种禾，一岁再熟”。苏州、湖州等地虽多种晚稻，也在割稻之后同样复种一季小麦。这样，

谷物的总产量就得以大幅度增加。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的出现和推广，是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各地农民还积极从事于土地的垦辟。北宋初年，唐、邓、襄、汝等州郡，“地多山林，人少耕殖”，到北宋中叶，这地区却已是“四方之民，辐辏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了①。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山地带，农民们积极开山为田。从北宋初年以来，福建境内的农民“缘山导泉”，在山田里种植水稻。江西抚州、袁州等地的农民，也都把岭坂开辟为稻田，层层而上，直达山顶，在那里“山耕而水苗”。湖南潭州的农民也大量地垦辟山田“畲禾”，使当地“山田悉垦”。北宋一代南方实际垦田的面积大为增加。

茶树的栽种也较前大有发展。当时的淮南、江南、两湖、福建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产茶出名。其中以淮南的产量最大，北宋政府在那里置场，督课园户茶民采制，实行专卖制度。其他产茶地区每年输送给北宋政府的茶专卖机构的，约为一千四五百万斤。四川所产的茶，北宋政府虽不许其出境销售，但其产量也很多。

北宋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北宋的手工业，在生产规模、产品数量、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比唐代有较大发展。采矿、丝织、制瓷、造纸、造船等生产部门的发展尤其突出。独立手工业生产比在北宋也显著增多。

采矿业的一个重大发展，是石炭（煤）的大量开采。河东（今山西省）境内居民，当时已普遍用煤炭作燃料。北宋都城开封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也全用怀州（今沁阳县）出产的煤炭作燃料。相州、磁州都是北宋主要产煤地区。年近在河南鹤壁市发现北宋煤矿遗址，据其竖井矿口和开掘巷道的规模看来，当时的采煤工人有好几百。江西的丰城、萍乡两县山间的煤炭在北宋时也已开采。

鉄的开采和冶炼，一般由民间冶戶經營，政府只在主要产地设监督机构，抽取产品作課稅。北宋鉄課年額，最高为八百多万斤，約为唐代最高年額的四倍。北宋中叶，徐州利国监轄冶戶三十六家，每家役工徒百余人，总计达四千人左右。北宋政府每年从这里征取三十万斤鉄課。地方官用当地的煤炭冶鉄作兵器，“犀利胜常”。煤的火力強，用煤冶鉄可使鉄的质量提高，对于改善兵器和农具所起的作用都很大。北宋时用煤冶鉄的作坊已經很多。

北宋政府在一些地方也直接设监采鉄和炼鉄，把各地被判决服重役的“罪犯”发配到监中去劳作。商州的一个鑄鉄监，在十一世紀中叶，就有这样的“罪犯”两千多人。

銅的开采和冶炼也分官营民两种，民营由坑戶經營，官营由政府直接设場，役使“罪犯”和兵匠进行生产。民营銅場的产品也必须全部交納或出售于政府。官营銅場規模很大，广州的岑水銅場和信州的鉛山銅場，經常有十万以上的人从事生产。鉛山的銅場还采用由胆土（即硫酸銅）取銅的办法，用来制造大量的錢币。北宋的銅課年額，最高为一千四百六十万斤，約为唐代最高年額的二十二倍強。北宋銅錢鑄造年額，最高为五百另七万貫，約为唐代最高年額的十五倍以上。

北宋中叶的李昉，曾描述当时民间絲織生产的盛况說：“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閨長飢渴。……茧落山立，繰车之声连巷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务此。……爭为舒巧，以激倍息”^①。这反映出，絲織业在当时虽还是农村家庭手工业，但其中已包括一些商品生产。絲織的技术水平，当时仍以四川地区为最高。江南地区的絲織业的质和量也都日益胜过北方。絲織物的花样和品种，比前代增加了很多，染色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刻絲和刺繡都极其精致。在四川、河北、山东、江南各地

① 《李直讲文集》卷十六《富国策三》。

的独立絲織业作坊，叫做机戶。机戶中的劳动人手大都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四川梓州（今三台县）有机戶数千家。大型的絲織作坊都是由官府或豪绅地主开设的。官营作坊大多“拘占机戶”从事生产，还在这些机戶的手背上刺字以防私逃。私营作坊中的募工虽不刺字，其所受封建性束缚也很强烈。

北宋的造纸业有普遍发展，在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当时有很多地方分别采用竹子、大麻、~~棉~~、楮和木棉等不同原料，制造质地不同的纸张。江浙一带的纸坊，开始采用嫩竹制造质地轻薄的纸张。稻秆、麦秆都大量用为造纸原料。徽州地区的纸坊工人，能够大量生产长五十尺一幅的纸张，“自首至尾，匀薄如一”。这是需要几十名纸工协作生产的。它突出地反映出北宋纸坊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纸的印染技术以成都为最高，能染出十来种不同采色的笺纸。两色套印的办法也在北宋时期出现了。徽州、成都、建阳以及江浙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已成为纸的著名产地。

北宋的制瓷业有飞跃的发展。烧造瓷器的窑戶，当时已遍布全国。产量比前代大为增加。瓷器的制造技术，无论是器形、采釉、刻制花纹和烧制方面，都较前代大为进步。各地烧造的瓷器，都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特点，著名的如：河北定窑的白釉瓷器，河南汝窑、钧窑、开封官窑和浙江龙泉窑的青釉瓷器，建州窑的黑釉瓷器，江西景德镇窑的影青釉瓷器。瓷器是北宋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远销到日本、朝鲜、南洋各国、印度、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东部沿海各地。

北宋时造船业也很发达。浙江的明州、温州、台州、婺州，江西的虔州、吉州，湖南的潭州、鼎州、陕西凤翔的狄谷等地，在当时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从北宋初年以来，每年由这些地区为政府制造的漕运官船在三千只以上。当时航行于长江的最大船只，称为万石船，能载米

一万二千石。海船建造的中心在明州、泉州和广州。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外商人所乘用的大多是中国制造的船只。这种船下侧狭尖如刃，便于破浪，抵抗除涛破浪的能力比当时外国船舶为强。

〔商业。海外贸易〕 在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北宋的国内外商业都比前代有很大发展。

北宋时期，各地农村中的草市、墟市或坊场等定期集市更加普遍。农民们都到集市上去出售或买进某种农产品或手工制品以及牲畜、农具之类。北宋政府把从坊场中征收的商税与从大城市所收商税列为同等重要项目，可见集市交易在当时各地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上，都已占居相当重要的地位。

城市经济也有发展。首都开封城内外街道上，随处都有商铺、邸店、酒楼、饭馆，单是参加到行会内的店铺就有六千四百家。洛阳、扬州、杭州、成都等大城市的繁盛情况也略相似。完全突破了唐代城市区分为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在这些城市里也都出现了夜市。传世的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开封汴河上店铺林立、运输繁忙、市民熙来攘往的热闹场面。

北宋的对外贸易，比唐的极盛时期还有所扩大。唐代只在广州一地设置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北宋则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扬州和密州的板桥镇都设置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地区，有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印度、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埃及和东非洲。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金银、铜钱、铅、锡、各种丝织品和瓷器，输入的货物则主要为香料、药材、蕃布、铁和各种奢侈品。中国的铜钱大量流往国外，日本当时就兼用中国铜钱。从广州开出的海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瓷）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处。”市舶司从进口船只上征收 税款和买物，是北

宋政府一项重要財政收入。因此，每当外国的商人不来或来的較少时，宋廷就常派遣使臣前去招致。

海外貿易的发展，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經濟文化联系，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紙币的出現〕 北宋政府每年所鑄銅錢数量虽已較前代大增，但因商品貨幣关系的日益发展，其銅錢数额仍不能滿足社会流通的需求。不产銅或产銅較少的地区，例如四川，还使用极为笨重的鉄錢。在十一世紀初叶，四川成都的几家豪富地主联合发行了一种紙币，叫做交子，代替鉄錢行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币。其后不久，北宋政府收夺了私家发行紙币之权，由政府在成都设置专局，叫做交子务，負責印制和发行紙币的事。此后，随着商品經濟的发展，行使紙币的地区越来越扩大，交子的发行数量越来越多，北宋政府就在首都开封设置交子务負責印制紙币。到北宋晚年，陝西、河东、京西、京东等路以及淮南地区全都是行用交子的地区了。

〔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 北宋时期，較大城市中的商人，都按照不同的行业而組成各种行会。行会的首脑称为行老或行首。行会都規定了“行例”，加入行会的商戶都要遵守。各种貨物的价格，也都由行会加以审定。政府通过行会对商戶进行控制和勒索。北宋的許多官吏都在暗中出资經營商业，实际上行会就操縱在他们和豪商大贾的手中。不能参加到行会中去的小商贩们，經常遭受到同业行会的欺压，因而也經常与之展开斗争。

手工业者的行会，或称为“行”，例如做鞋的称“双线行”；或称为“作”，例如“木作”、“油漆作”、“腰带作”等。在手业者当中作坊主或店主，工匠，学徒，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等级，这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城市手工业中的一种反映。所以，宋代的手工业者的行会乃是一种